

李松晨 著

王震的青少年时代

骁将之初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骁将之初

——王震的青少年时代

李松晨 著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骁将之初:王震的青少年时代/李松晨著. —北京:
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00

ISBN 7-80092-918-3

I. 骁 ... II. 李 ... III. 王震 - 生平事迹

IV. K827 =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1099 号

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:100009

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 × 1168mm 32 开 10.625 印张 3 插页 216 千字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

王震同志与本书作者李松晨合影



王震同志在家中接受本书作者采访

王震同志一九四四年于延安写的《历史自传》手迹

刻真自传
我的历史自传
思想自传
因出细始末
王震
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

王震同志题词勉励作者

王震
凡行三思
实求思
调查研究
深入实际
业精于勤
噪勉
李松晨同志

我的历史自传·（青少年部分）

王 震

一、家庭、童年及进城谋生

我一九〇八年四月十一日生于湖南浏阳北盛仓马腕桥的佃户家庭。我知道我的曾祖父就是浏阳县中立局（曾国藩办团练的机关）的佃户。我六岁启蒙，入私塾读书，七岁因病辍学，八岁、九岁继续读书，十岁因打了地主儿子被迫又辍学，后又入私塾，十二岁终止学业，为家里看牛作田。这时我的祖父母都在，我的父亲兄弟共五人，祖父六十多岁还在劳动，是一个种几十亩稻田的大佃农。

到我十三岁时，家庭因经济困难和不睦而分居。我的父母同我舅父姑父商议，叫我学石匠，学三年赚四块钱，我不愿意学，继续在家作田。少年时代我萌发了反抗压迫的思想，喜欢学拳习武，农闲在梁陂岭亲戚赵家学大正拳二年，

* 这是王震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在延安写给彭真和中央组织部的自传，此处仅摘引了青少年部分。

受益不浅。一九二二年九月，即十四岁这年，我想闯闯世面，偷跑到长沙，在赵恒惕的募兵处报名当兵被收入陆军测量局兵营里，给一个同乡的新兵连长当护兵。我是个“乡巴佬”，出去到街就不知道回来的路。一次由藩正街到青石桥买东西，只需二十分钟，我走了一天，因而回连挨了打骂，我忍受不了，就逃走了。

这时我的当兵思想并未打破，因年幼还得暂时找个谋生之计才成。于是跑出城外，找到一家种菜园的，我即每天跟着同乡菜贩，挑小菜到城里卖。跑熟了街道后，又拉洋车，这样认识了一个铁路局的副站长黎湘，找他介绍到铁路局当工役。这就是我一九二二年九月到一九二三年上半年进城当兵、卖小菜、拉洋车的情形。

二、铁路工人的生活 and 参加革命运动

进铁路局时，我在长沙车站当长夫，打扫车站及月台，搬行李，送电报，守电话，火车进站打点等等。

这个大火车站的长夫共三十多个，月薪是六块钱，分日夜班。作夜班，白天可以替乘客背行李，赚一二角钱。车站的职员当班时，他们家里担水等差事，也都是长夫的事。

一九二三年四月，火车站附近办了个平民夜校，有铁路职员宣传、组织工人到夜校去读书。因火车每天往返只七八次，长夫每天事情并不十分忙，晚上有时间到夜校读书，我即参加夜校。开始读的是平江李六如编的平民读本，并有通俗日报，常常读给我们听。星期日上午还有三个钟头的课，但长夫没有星期日，故这一天的课，当班的就不去上。

一九二三年的八月，我被调到新河车站当长夫，不多时就作替班分道夫（又名转辙夫）扳岔路。这里也有工人夜校，设立在新河街。有铁路局工人、面粉公司工人和码头工人来参加，故人数很多。这时，我被举为夜校纠察员。同年冬季，在新河铁路工程处材料厂内专设了工人夜校校址。

一九二四年二月，我被调到机务处的机车房当擦车夫，月薪九元。纪念“二七”时，在新河铁路转运公司堆栈开纪念大会，会场由纠察员维持秩序。因为在机车房工作，每天十二小时工作，上下班来回需走五里路，又因工程师监工管理严，我受到几次罚工的处分，后来我去夜校少了。

一九二四年四月，铁路职工会征收会员，我由罗月生、小段（电报生）介绍加入，并分配我作机务处职工月捐征收员。凡加入职工会的每月均要出月捐。由于职工运动的发展，这时工人全加了薪金，我由九元加到十一元。这时的月捐，九元到十五元薪水的出一角，十六元到二十元的出二角。

一九二五年，仍担任征收月捐员。春季工人纠察队扩大为九十人，我开始当小队长，这时由卢炳夷、易定鳌介绍加入了国民党。六月开工人大会，到城里游行示威，我被举为纠察队分队长，并被以擦车夫的名义，调到工会工作。六七月间，我当选为粤汉铁路长沙职工分会的执行委员。

一九二六年职工会改组，长沙职工会分会改为粤汉铁路总工会长岳段分工会，我的执委落选。我当纠察队第三中队队长。纠察队是以护路队的枪武装起来的，大队长石应典十月间调我到湖南总工会工人干部队学习当四班班长。卢炳夷及邱受耕又几次想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我因挨过英

籍工程师泛尔毕的打，故有仇视外国人的成见，认为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，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帝国主义。我有这个错误的认识，未被批准入团。以后与罗月生、卢炳夷经常接近，及到工人干部队，郭亮来上课，已经觉悟把外国人认为就是帝国主义是错误的。一九二六年底，过年时放假到新河，由卢炳夷、邱受耕介绍，举行入团仪式，正式加入了CY。干部队政治课为三民主义，文化课每天一块小黑板写八个字来学。我学军事有兴趣，努力，对政治课、文化课次之。有《工人日报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，我都看看，有打仗的消息，则特别注意。以后上课讲共产主义浅说，讲阶级斗争，才觉得有味道。同时开会很多，开大会都是我们去警卫。

过年后，我当代表到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总工会开会，并参观湖北总工会纠察队，住了两三个星期，又回长沙。一九二七年五月转党，成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，马日事变前几天，总工会秘书长欧阳梅生，铁路分工会赵秘书长，工人干部队长伍文元，及纠察队总队长袁楚贻（袁仲贤）上课，均谈情况紧张，将我调到总工会，担任警戒。五月二十一晚，在东茅巷被许克祥进攻即马日事变。打了不到一点钟，我们因寡不敌众，被迫撤退。我持枪断后，陷入包围。纠察队本来全穿蓝衣，我将一个军事教官的灰衣服穿上，方才脱身，到柑子园被打了一枪，右腿膝下处受伤，又急走荷花池出经武门坐洋车跑到新河车站。分工会纠察队只有几个人在巡逻，还不晓觉城里已经发生事变，其他人仍在睡觉。我将工会人员喊起，天快亮了，方感伤口疼痛。我由卢炳夷、罗月生周旋，得铁路局入

院证，住院治疗。一个星期我就出院了。

事变后，分会委员长卢炳夷，组织我们秘密做党的工作，其他人员仍在铁路上做工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到医院住了一周，月底回来，被派出去贴标语，在司门口被逮捕，公安局押了一天，送省政府，由路局工程师、站长、段长保释，即被放回来了。那时认为唐生智还革命，标语是请唐总司令恢复湖南工、农会及工人纠察队、农民自卫军等。

七月，平浏醴农会及农民自卫军扑城，进攻长沙。原来的工人纠察队准备内应，我当中队长奉命响应农民的武装行动。农民未到城下即被敌人击退。我们未暴露。

这时我在铁路上的职务，是机务处的升火夫，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没有跟车生火。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，马日事变后，我作地下交通，经常跑岳州、安源，很多时不能做工，找人替班生火。

九月秋收暴动，在罗月生、石应典、陆麻子等领导下组成二十几个人的破坏队，我当分队长，晚上去破坏铁路，各翻车一次，响应秋收起义。到十二月广州暴动的前后，湖南又来了一次暴动（灰日暴动）。组织破坏队，我当中队长，只有二十几条枪，我那队配置四条，有车务处、工程处、机务处的工人参加。首先破坏了铁路局的电话电报机等及新河光华电灯公司。暴动队攻打到北门，城门口、城外马路上有机枪火力封锁，敌我力量悬殊，暴动未能成功，但因从城外进攻，故暴动队伍尚未遭甚大摧残。天还未亮，大家将衣服换了，枪藏了。我被罗月生派到城内，到皇后街以前介绍我到铁路局做工的黎湘公馆（他家有几个思想进步的学生，住的离湖南日报馆很近）。罗月生叫我买一张报，打电话告诉

他刊载消息情形。那天报上的头一条消息便是“暴动共匪尽是新河铁路工人”。他听后立即派摇车到北站接我回去。罗月生、易定鳌向工程师、段长、站长等交涉，说报纸刊载的消息是无根据的，随后该路员等即到省政府交涉。（时宁汉战争前夕，唐生智全靠铁路运兵和运输物资）反动省政府为免生罢工事端未取高压手段。暴动虽失败，但参加暴动的铁路工人并未受大摧残。

罗月生、卢炳夷、石应典、邱受耕、易定鳌，都是在工会中有威信的。我生火月薪十七元，罗月生同我父亲要好，父亲每月二十八日即来，因为我好花钱，罗将我的薪水交给我父亲十元，有时十二元，余下的留给我吃饭及零用。

罗月生叫我当交通，政治环境虽不断恶化，白色恐怖严重，但那时他同我讲革命尚有希望，因苏俄存在，革命胜利前途无问题。我当交通，送宣传品、送信、送人，常到的地方在长沙是北门外朱家花园及城内学宫街等地，外埠是株洲、安源及岳州，那是利用我跑班的时候。

自湖南秋收暴动后，白色恐怖更残酷。何健任命张国威当湖南卫戍司令，在铁路系统组织所谓护路队对我党活动严加监视。罗月生叫我打牌赌钱，打打茶围，我同一般工人生活在一块，这样来掩护秘密活动。这时车站上住有清党委员会（国民党的极右组织），所以凡积极参加过工运而红一点的人，都叫这样做，有意使那些家伙不注意。当我被派出工作时，工友们则说是打牌去了。工友如此应答，自己也如此对付，以掩护工作。

蒋唐战争（宁汉战争）是一九二七年十月爆发的，一九二八年初，唐生智战败。这时罗月生派我到汨罗当交通，到

那里以临时替班分道夫作名义，但当我到那里时，铁路上的人已全部跑光。唐军向湘西退却。罗月生告诉我到那里不要走，日夜守着入站扬旗岔。遇有人接头将其送至朱家花园。但始终没有人来，我也未走，后被军队抓去，挑担子，跑了又被捉回，只好跟了走。挑担子背机枪一直到常德才得机会逃脱，肩膀已被压烂，跑回长沙。罗月生将我送入医院，住十几天，出院后仍在铁路上做工，在党内当交通，曾送过人到安源和岳州等地。

一九二八年四月，罗月生、卢炳夷派我送八个人到岳州，湘潭、长沙、浏阳等地的人都有，随四次票车走的，车上不是我的班。当天夜里，易定鳌自首叛变，将党的组织全部供出，何健九点钟派军队捉人。我到岳州一下车即知新河出事。我们一行九人还是由党指定住樵运局，一个姓李的同志不愿意久留我们，接上关系即叫我们走，送我们路费六十多元。从此我们失掉了组织联系，而过流亡生活了。

三、一年多的流亡和秘密工作

一九二八年五月到一九二九年六月，是流亡时期。

最初到武昌，住鲇鱼套转运公司，是个人朋友关系，后来找了一些铁路上熟人，借些钱维持生活。同行的九人，后又有另外几个逃难同志在一起，共十三个人，分住在武昌造币厂及汉口宝广会馆。此时，造币厂已停工，厂内有个警备队，共六十人，都是湖南人。党的关系仍找不到。十三个人中有十个是学生，全找不到事情，生活困难，其中有一个农民，一个苦力，我同他二人到汉阳鹦鹉洲背树，来维持大家

生活，以后肩背肿了，疼痛得不能去背，即做小生意，卖削皮慈菇维持生活。

七月间找到介绍我到铁路局的黎湘的哥哥黎伯努及其妹妹黎杰（北师大学生），告诉我们长街九号一个女的叫王一知，可以找到关系。王一知是张太雷的夫人，我找到了她，她叫我们到军队中去。这时广西军阀李宗仁、胡宗铎、陶钧杀人杀得很厉害，我们到湖北警备军去当新兵，生活很苦，同行的学生都吃不消，搞了十几天，又开小差出来，仍住进造币厂。

后经黎杰找到党的关系，同我们一起的学生黄宗佑、李志忠，去考十八、十九军随营学校去了，我则到第一师李明瑞司令部当传令班长，其他人仍在外边住着。以后组织上通知，叫我们流亡的同志全打入武汉警备部队，以发展党的组织。我即请假离开第一师又到湖北警备军第五团（团长杜道同内战时任湘军十六师旅长）一营二连，去当新兵。我当四班班长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初。在党组织的大力活动下，这个军队中发展了很多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，多半是湖南、湖北及河南南部一带的人。我是五团党支部委员（代号建城），领导人是监利县的王雨村。正值桂系准备战争，警卫团也加紧练兵。士兵生活很苦，冬天练兵时要挑操场上的雪，后来又在洪山做工事。此间，党组织曾几次议论过搞兵变的事。

一九二九年桂系由武汉退却时，我随军到监利县，经王雨村告诉我党的关系及见壁上标语和传单，找到洪湖地方党。因道路泥泞，晚间行军学生都掉了队，王雨村也掉了队，我与赵汝卿等二十二人，拖出二十四条枪交党，准备参加洪湖赤卫队，但当地党不肯留我们，每支枪给二十元钱，

要我们走，关系又断了。

回到武汉，又找黎杰，黎要我到河南开封第一中学找事，并找党的关系。河南党被破坏，未找到关系，住十多天，又回武汉。

黎杰的侄子黎升恒，同情共产党（中央大学学生，此人一九三二年由上海到湘赣苏区找我参加革命），介绍我到麻城县硝磺局，以便转到黄岗找红军，因夏斗寅军队在那里，又回来了。

于是到湖北大冶铁厂（汉冶萍公司）做工，一个前在铁路上的监工，是个工贼，知道我过去当纠察队长，要抓我，组织上通知了我，我便又逃走了。到武汉，黎杰告知朱毛彭黄的红军在湘东北。一听说家乡有红军，很高兴。我们一起二十几个平、浏、长的流亡分子结伴回长沙，住在长沙郊外。

四、回浏北工作和参加游击战争

到了长沙，派高如意（前浏阳北盛区区农协委员长）去浏阳找党的关系，但未等他回来，我们在长沙东南渡一个木匠铺找到党的关系。

这是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，首先找到的是平江县委关系，有几个平江人回平江去了，我们即到浏阳。一同来的有彭晓程、赵汝卿、高如意、汤铭等十余人，成立十八区、十九区区委。一九二九年底，两区开区联席会议，成立区联队（游击队），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，发展农会。我找到苏牢（劳），他开药铺，经常到他那里去，后介绍他入党。区联队

成立，张正昆（坤）当队长，苏牢（劳）任政委，我当十九区区委书记，及区联队特支书记。

开始区联队只四支枪，这就是我在十九区工作时夺取周首生家的。旧历年关，领导农民分粮，首先攻打北盛仓，将百多人之靖卫团打跑，缴了十一条枪。浏阳县委派徐洪来北乡，游击队又搞到几条土豪的枪。何键派部队来“进剿”，即将公开露面之农民带到浏阳平江交界的地方——炉烟洞。

我与彭晓程、汤铭等又去做二十二区，即长沙、平江、浏阳之交界地的工作。斗争更激烈起来，何键军队退了，我们在二十区经支部帮助又在土豪家搞到九条枪，区联队即扩大了。一九三四年三月区联队改浏阳一支队，我仍为一支队特支书记，及十九区区委书记，在浏阳北乡及长沙东乡之间开展游击斗争。后成立二十一区。当时党在一支队中还是秘密的，我以宣传员的名义在一支队工作。到区委，我又以宣传员名义离开，去地方工作。当时党决定由十九区发展二十一区的工作，在靖卫团挨户团中进行工作。四月底我到碗竹尖收二十余人“土匪”（北伐军溃散士兵），有十一条枪，同一支队会合，第二次打北盛仓。

五月间，十八、十九区公开成立革命委员会，二十、二十一等区相继成立。群众发动起来，浏阳县委指示发动浏北暴动，组织了赤卫军第六师，我当政委兼师党委书记，指挥一支队，我仍兼其特支书记。一支队有七八十条枪，由浏阳北乡进攻浏阳县城未克。

彭德怀同志经平江打长沙时，平浏靖卫团挨户团亦更猖狂。这时，赤卫军第六师及一支队去长沙（第六师有一万余人队伍，尽鸟枪、锚子等等），进抵永安市时，我奉令率领

第六师及一支队一小部，保护平浏交通，在退出长沙时，一支队、赤卫军第六师随三军团到浏阳城。红军退出浏阳城，我们仍回北乡了。

第二次打长沙时，平南、浏北没有红军，因此第六师及一支队与地主武装及何键八十八团斗争。第二次长沙撤围时，一支队队长政委都负伤，这时，我兼一支队队长及政委。接县委信，叫我带一支队去组编湘东独立师。这时是立三路线达最高峰时期，一条枪也要集中打大城市，赤卫军第六师由徐洪同志任师长，赵汝卿任政委。

我带一支队走时，留下三十支枪编入第六师特务连，我带走一百四五十人，一百一十支枪。至浏东高坪经袁德望、张启龙等指示组编湘东独立师。

这是一九三〇年九月，我第二次离开家乡，开始了新的征途。

责任编辑	张	永
封面设计	赵	型
版式设计	高	歌
责任校对	胡	南木